

November 2014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ing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Ning. 2014.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6): pp.30-3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6/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孟而康、比较诗学与世界诗学的建构

王 宁

摘要: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虽然精英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但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比较诗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孟而康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作者认为,尽管孟而康并非是把目光转向东方的比较文学和文论研究的第一人,但可以说,他对跨文化比较诗学的全面探讨却超越了他以前或同辈的艾金博勒、佛克马和刘若愚,进入了总体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境地,这显然与当今的世界文学话题比较接近。作者认为,孟而康的贡献不仅仅止于对比较诗学的拓展,他还对世界诗学的建构作了某种预示,可惜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而未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入讨论,而本文作者则沿着孟而康未竟的事业提出了自己关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 孟而康; 比较诗学; 世界诗学; 普世性; 建构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wangning@tsinghua.edu.cn

Title: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circl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poetics dealing with literary theory still occupies a position although elite literature and its theory are impacted by cultural studies. In this aspect, American comparatist Earl Miner'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lthough Miner was not the first to shift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Ea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it may be argued that his intercultural explorations into comparative poetics have surpassed his precursors or contemporaries like René Étiemble, Douwe Fokkema and James Liu, entering the field of general literary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Miner's contribution not merely lies in expanding the domain of comparative poetics, but also anticip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His unfortunate early death denies him further endeavor into the ambitious project. In the light of Miner'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he present author tries to offer his own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poetics.

Keywords: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world poetics; universality; construction

Author: Wang Ning is Zhiyuan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wangning@tsinghua.edu.cn

孟而康(Earl Miner, 1927-2004, 又译厄尔·迈纳)这个名字如果不在括号中注明其英文原文,也许会被误认为是一位中国学者,确实,在中文的语境下,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但是在英语世界的比较文学界乃至整个国际比较文学界,他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

理论家。虽然他并不能算是一位汉学家,但“孟而康”这个名字却是他自己认定的中文名字,而且他亲自为自己著作的中译本撰写了序言,以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热爱以及对已故中国朋友的缅怀。因此本文沿用他自己钦定的中文名字。由于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因此他讨论比较诗

学问题时自然有着广阔的跨文化视野。孟而康不仅在日本文学方面造诣深厚,同时对弥尔顿也颇有研究。他生前曾出任美国弥尔顿学会会长,并担任过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他在比较文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90)。^①这部著作自上世纪90年代初问世以来即被译成意大利文和德文,中译本也几经周折于90年代末问世。今天,在跨文化研究已成为现实的语境下重读这部著作不禁使我们感到,孟而康生前所致力于的比较诗学研究预示了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者据此进行的世界诗学的建构。因此,在提出我的世界诗学构想之前,我认为有必要从今天的视角对他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的这部旧著进行重新解读。

《比较诗学》的跨文化解读

谈到比较诗学,我们会立刻想到亚里士多德的不朽著作《诗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从文学作品中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他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理解,而且集中讨论的是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后来的历代西方文论家不断从亚氏的理论出发,发展或修正了他对诗学的思考和定义,并逐步用意义更为宽泛的文学理论来取代它。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文化研究的冲击,传统的文学理论逐渐呈萎缩之态势,诸如“美学”和“诗学”这样一些注重文学形式的术语逐渐淡出了批评的理论话语,代之以“批评理论”、“文化理论”或干脆“理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期刊上。就连比较文学这门曾经的新兴学科也被文化研究挤到了边缘,好在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迅速作了调整,使得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得以相互交融乃至进行对话。但是在比较文学领域内讨论诗学问题仍显得“不合时宜”,或至少是不入主流。既然孟而康的这部著作名为《比较诗学》,也即既涉及比较文学,同时又讨论诗学问题,自然在出版之后不久就很快被淹没在文化研究和各种新的批评理论话语的汪洋大海之中了。但学者们对比较诗学的研究却始终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进行。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些不满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界有识之士鼓吹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从而使我们想起孟而康这位率先致

力于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的先驱者以及他的这部旧著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我们今天重读这部旧著,不禁欣喜地发现,孟而康在书中讨论的不少问题都在当下的理论讨论中得到体现,并且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我们在重读这本书时自然不能重复孟而康的观点,而是要在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文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有所超越。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在哪一个层面上实现这种超越呢?孟而康的这部著作的两个关键词恰好涵盖了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方面。

首先应在诗学的层面上有所超越。所谓诗学就是文学理论,而比较诗学实际上就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对文学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是长期以来,亚里士多德对诗学的定义和描述一直被奉为经典和不可颠覆的金科玉律。尽管亚氏之后的各种批评理论超越了其模仿论,将其扩展到了实用论、表现论和客观论的层面,而且艾布拉姆斯也在自己的著作《镜与灯》中对各种批评理论作了比较、梳理和总结,但他所依据的作品仍主要来自西方文化传统,所进行的比较仍在一个西方文学的语境中进行。虽然兴起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变体被称作“文化诗学”,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致力于建构的这种文化诗学也只是将文学本身的领地拓宽了,并没有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因此孟而康清楚地知道,要想从根本上动摇这一有着牢固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诗学之定义,那就得走出西方文化的传统,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在这方面,孟而康基于自己渊博的东西方文学知识和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和美学造诣,得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从一个跨东西方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诗学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既然孟而康的这本书名为“比较诗学”,那么也许人们会进一步问道,究竟什么是比较诗学呢?孟而康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界定,他认为,“一个学术领域,就像一个家族,对其界定可以从整体特征着眼,也可以从具体组成部分入手。比较诗学兼属诗学和比较文学两大家族。就像其他跨文化研究一样,是个新生事物,方兴未艾”(迈纳342)。而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藩篱,在一个广阔的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语境下提出一些具有普世意义和价值的美学和诗学原则。应该说,通过他的旁征博引

和详细论证,他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正如他在该书绪论中所指出的,“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性的诗学就发展起来了”(27)。针对长期以来占据欧美比较文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孟而康问道,“然而,我们的‘比较文学’为什么就该缺乏一种东半球和南半球的视野呢?”(28)。他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却身体力行,把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东半球的日本和中国的文学和诗学,这实际上就已经间接地回应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

纵观现代比较文学的历史,我们发现,即使在西方学界,孟而康也并非是把目光转向东方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但我们却可以说,他对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的全面探讨超越了在他以前或与他同辈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艾金博勒(René Étiemble)、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刘若愚(James Liu),进入了一个总体文学和文论研究的高度,这显然与当今的世界文学话题比较接近。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讨论。众所周知,在他以前的法国学者艾金博勒、荷兰学者佛克马和华裔美国学者刘若愚都是杰出的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他们以其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实绩为国际比较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风,提出了不少富于启发性的洞见,特别是刘若愚借鉴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尝试已经接近中西比较诗学的境地。而孟而康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又综合了中国和印度的经验并引进了日本文学的范例,从而真正达到了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的境地。他的这种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工作无疑为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继续探索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种跨文化的综合考察,孟而康发现,从文类的视角出发有可能对以往的诗学成规提出修正性的意见。他进而指出,“只有西方这一种文学体系是建立在戏剧之上的,而其他体系皆基于抒情诗(印度诗学同基于抒情诗的诗学体系一样,根据情感—表现诗学来界定)”(333)。这一特征贯穿于两千多年来的东西方文学史。但是孟而康并非只是一位专注文学史的学者,而更是一位理论家,因而他更加注重理论分析。他认为,“历史和理论上的严谨必不可少,但老实说,我不

能忽略以下两点:以历史为基础的‘比较’常常发现的是细节的相似与差异;而从理论出发的‘比较’则又常常会得出毫无新意的相同结论”(336)。而他所要达到的就是同时超越这二者,因此他认为,跨文化的取证尤为重要,通过这种将东西方文学作品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下来考察,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他看来,“总的来说,中国倾向于道德层面而日本则更着意于非道德说教的情感主义”(338),而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则应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绝不盲从。这是孟而康在写完全书时所作的总结。应该说,他的这番总结仍然停留在比较文学和文论的平行研究层面上,并未上升到自觉的世界诗学理论的建构之高度,而这正是我们所要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从而达到比较诗学的超越和建构的出发点。

诚然,在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自觉地将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的重构和文学史的重写结合在一起,^②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我认为这只是开始,如果我们读完孟而康这部著作,也许会受其启发,并将其用于建构一种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我在下面提出我本人对世界文论的构想之前,首先要强调,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这个话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世界文学和理论现象的比较研究和分析,旨在建构一种具有普世准则和共同美学原则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Zhang 319-327)。它既非始自单一的西方文学,也非建基于单一的东方文学,更不是东西方文学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对世界优秀的文学和理论话语的研究所建构出来的一种既可用于解释西方文学现象,同时也可用于解释东方文学以及整个世界文学现象的阐释理论。应该说,这正是我们后来的学者所要对孟而康的比较诗学研究达到的超越。

世界诗学的构想

在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尽管许多学者也介入关于“世界文学”之涵义的讨论,但很少有人深入地探讨理论问题,这些学者也不企望建构这样一种世界诗学。^③实际上,世界文学伴随着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大的论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吸引东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者,其中一些主要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的各种定义。同样,不少学者已经试图将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以及重写文学史等论题相结合,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但是在我看来,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至今无人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如果我们重读孟而康的这本著作的话,我们完全可能受到他的具有开拓性但却未完成的工作的启发,进而自觉地去建构一种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尽管在当时他并没具有清醒的建构意识。但是他在进行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的比较研究时,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收集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

一种生成性诗学在历史上是相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而存在的[……]尤其是当文学被看作是一种自满自足的知识时,也即当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从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受推崇的文学实践来定义文学的时候,尤其会产生一种系统性的诗学。这些文学实践被我们称作基础文类。它们包括西方诗学的基础文类戏剧。它们也包括抒情诗,这是其他诗学的基础文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包括叙事性文类,因为在东亚,某些史学类著作也和抒情诗混杂在一起,而在日本,诗学体系刚一建立起来,就有了关于叙事文学的定义。(314)

细心的读者一下子就可以注意到,孟而康在这里两次提到他有意建构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诗学“生成性诗学”(a generative poetics)诉诸一种有可能成为普世意义的诗学,而“系统性的诗学”(a systematic poetics)则指涉有着一个“自满自足”(autonomous)体系的诗学。虽然他并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的”(universal)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然后才有可能具有普世意义和价值。显然,孟而康仍然持有一种带着精英意识的经典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因而他在书中

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但在另一处,他却指出:

因此,对文学或其他类型的知识来说,自满自足性并不完全。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彼此不同。换一个角度来说,知识的自足体也具有某种相对性。我们并不被文学与其他知识类型的那种难以描述的关系所缠绕(因为没有关系或内在关联)。因此这一结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看都是站得住脚的。(311)

在此我们发现,尽管孟而康集中探讨的是文学的形式特征,但他仍然为我们建构这种(世界)诗学的“自满自足的”体系留下了空间。接下来,人们要问,我们从上述这番不太清晰的描述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可以想象,孟而康十年前去世时并不年迈,因此他倘若今天仍健在的话,他必定会热情地欢迎世界文学的崛起。我认为这也许是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位从事跨文化比较文学和诗学研究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的原因,因为正是他未竟的事业激励了我去进行这种理论建构。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纪念孟而康并且重读他的旧著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全面地阐释我所要建构的世界诗学之整个计划,但我在此可以先描绘一下这一蓝图,以便今后逐步拓展并完善。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提出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这一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目的就在于建构一种有着共同美学原则和普世标准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世界诗学或文论并非简单地来自西方文学,也并非主要来自东方文学,更不是东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简单相加。它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阐释理论,应该在对优秀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的扎实研究之基础上加以建构,这样它就能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东西方文学现象。这也许正是我们应该超越孟而康具有开拓性但却未完成的事业所应做的工作,同时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关于这一世界诗学的建构之详细内容,我将另外专论,此处仅提出我的初步构想。

首先,既然世界诗学意指全世界的文学理论,那么它就应该像世界文学那样,同时以单数和复

数的形式来加以表述,我在早先发表的一篇探讨世界文学的论文中指出,

我们应当同时有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和具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两个概念,前者指一种可据以评价具有最重要的世界性意义的文学之标准,后者则指世界各国文学的不同的再现,包括翻译之形式。(Wang 4)

也就是说,前者用单数来表达,后者则用复数。我想将其用于建构这样一种世界诗学也同样适用。也即它应该这样来表述:总体的世界文论(world literary theory)和具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ry theories)。前者指这样一种总体的世界文论所具有的普世意义的很高的准则,它应该是世界优秀的文学理论的升华和结晶,后者则应考虑到来自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的具体文论。但是那些能够被视为世界诗学的理论必定符合普世性的高标准,必须可用于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因此,仅仅基于某个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论经验而建构的理论如果不能在另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研究中得到应用或推广就算不上世界性的诗学或理论。

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然地进入第二个方面:世界诗学必须具有跨越语言和文化之界限的特征。这样,西方文化传统中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来的历代理论家发展完善起来的诗学理论就应当用一种比较的方式在世界主义的视野下加以重构。实际上,在英语世界出版的几乎所有讨论文学理论史的主要著作中,非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或者受到全然忽略,或者简单地稍加提及,根本不占应有的篇幅。尽管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自满自足的诗学体系,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但迄今为止几乎西方的主要理论家对此都全然不知。而相比之下,在中国,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若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至少是不能登上大学讲台讲授文学课的。因此,对中国以及东方诗学的忽略和不屑一顾显然是探讨世界文论或诗学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的缺陷。作为一位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在此要说的是,编撰一部完整的世界文论史或诗学史应该包括符合这一标准的主要非

西方文论著作,尤其是像《文心雕龙》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文论著作。

第三,世界诗学必须可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现象。自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文学学者早就自觉地开始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国别文学和理论现象,在这一解释的过程中,原来有着地域局限的西方理论便自然具有了“全球的”(global)特征和普世的意义,而在许多情况下则在与当地的文学实践的碰撞和对话中打上了“全球本土的”(glocal)的特征。但在那些西方国家,即使在汉学家中,文学研究者仍然一直在沿用从西方的文学经验或文化传统中得出的理论来解释非西方的文学现象,例如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现象就显而易见。既然我们建构一种世界性的诗学理论,我们就应该克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否则一部世界诗学史就会变成西方诗学的简单的扩展版。

由此我们便可进入第四个方面:在建构世界诗学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普世性和相对性的结合,也即应当向取自民族/国别文学经验的所有理论开放。正如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描绘文学作品的特征时所指出的,“它们彼此是不对称的,每一个现象都独具特色,千姿百态,各相迥异”(Miller 33)。在各民族/国别文学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泾渭分明的状况,因为每一个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具有独创性的,“人们甚至可以把它们视为众多莱布尼兹式的没有窗户的单子,或视为众多莱布尼兹式的‘不可能的’世界,也即在逻辑上不可能共存于一个空间里的众多个世界”(Miller 33)。同样,孟而康在进行他的跨文化文论研究时也相当重视相对主义,并对其局限性也提出了批判性分析。既然诗学就是探讨文学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理论,那么它就应当像那些作品那样内涵丰富和对理论阐释开放。确实,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西方诗学总是比其他文化传统的诗学要强势得多,因此它经常充当着某种具有普世公认之合法性的标准,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美学原则则很少有可能去影响它,更遑论用以解释来自西方文学传统的现象了。但是孟而康对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和诗学始终抱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指出,“认为最伟大的文学都是最公正的社会的

产物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可以断定,用那一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创造出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品”(328)。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诗学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时,重要的作家或理论家也许来自小民族或弱势的国家。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的诗学之价值,切不可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

第五,世界诗学应该呈一种开放的态势,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因为文学本身已经在最近的一百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过去在文学的高雅殿堂里没有地位的文类今天已经堂而皇之地跻身文学之中,这一切均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样,文学理论今天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纯洁或自足了。在这方面,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多年前在表达他的新历史主义教义时指出,

[……]艺术品本身就是一套操作的产物,其中有些是我们自己操作的(最明显的就是有些作品原本并未被构想为“艺术”而是其他东西……),而其他许多东西则是在建构原作中所承受的。也就是说,艺术品实际上是装备着复杂的、为多人共享的一套传统篇目的创作者与社会制度和实践之间谈判的产物。为了谈判的成功,艺术家需要创造一种流通的东西,以适应有意义的、双方互惠的交易。(Greenblatt 12)

既然格林布拉特试图在经典文学艺术与通俗文学艺术之间进行谈判,那么他所试图建立的就是一种可以沟通艺术与社会的文化诗学。人们认为格林布拉特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所提出的文化诗学就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他在从事艺术批评时注重社会文化的因素就不足为奇了。那么我这里再引证另一位理论家的话,他就是结构主义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他倒是专注文学的形式因素的,他又是如何看待今天文学所发生的变化的呢?他在经过仔细考察后得出这样的印象“文学的领地对我来说简直大大地拓宽了,因为它现在除了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外,还包括了大量为公众或个人所享用的叙事、散文和随

想作品”(Todorov 16-17)。确实,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文学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那些毕生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担心印刷的文学作品是否迟早要被新媒体所取代(Miller 1-10)。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对文学理论应当做些什么呢?格林布拉特的陈述对我们的最主要的启示就在于他的这一观点,即经典的理论正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所有那些非经典的理论教义,因为它们中的一些或许会在未来跻身经典的行列。这样看来,世界诗学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经典文论的体系,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可以吸纳可用于解释文学现象的所有理论。

最后一点,也即世界诗学必须要经过翻译的中介才能在各种语言和文化中流通,毫无疑问,翻译会导致变异,尤其是文学理论的翻译更是如此。但是正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所总结的,理论和观念总是在旅行的,

从这个人传给那个人,从这一情境旅行到另一情境,从一个时期传到下一个时期[……]通常通过观念的流通而使得文化和知识生活得到滋养和持续,不管它是公认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影响,创造性的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观念和理论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运动既是生活的一个事实,同时常常也是知识活动的有利条件。(Said 226)

理论的旅行有可能使原来的理论在另一语境中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所有的语言来学习理论,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依赖翻译,因此翻译对于理论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按照德里达的说法,翻译又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种理论通过翻译能够把新的东西带入到另一文化语境中,例如就像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论那样,那么这一理论就肯定被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论或诗学。同样,如果一种理论或诗学仅仅适用于一种文化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绝不可能被视为世界文论或诗学。

这就是我力图建构的一种世界诗学之内涵和特征,权且当作孟而康的未竟事业的一个超越和

继续。当然,别的学者也可以提出另一些标准来判断一种诗学是否算得上是国际性的或世界性的,但是上述六条标准足以涵盖这样一种构想中的世界诗学之特征了。

孟而康的比较诗学在 当下语境中的意义

在上一部分我简略地勾勒了我本人关于建构一种世界诗学的构想,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孟而康及其比较诗学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虽然孟而康并不是第一个将学术兴趣从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转向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西方学者,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他的跨文化比较文学和诗学研究确实大大地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学术同行。我们甚至可以说,孟而康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已经接近我们今天对世界文学问题的理论探讨,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提及“世界文学”这一术语。

我们都知道,在孟而康之前或与他同辈的艾金博勒、佛克马以及刘若愚都在跨文化比较文学和文论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的研究和著述确实给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观点,特别是刘若愚创造性地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理论“四要素”(即宇宙、作品、艺术家以及读者)用于中国文论的研究已经接近了比较诗学的研究层次(Liu)。孟而康则在上述开拓者的基础上又往前加以了推进,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他在理论探索中,自觉地加上了他对印度和日本的文学及批评经验的深入研究,并且从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提取例证,从而使他的研究确实上升到了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的高度。

通过这种跨文化的考察,孟而康发现完全有可能从文类的角度对既有的诗学经典进行修正和重构。因此在他看来,“只有西方这一种文学体系是建立在戏剧之上的,而其他体系皆基于抒情诗(印度诗学同基于抒情诗的诗学体系一样,根据情感—表现诗学来界定)”(333)。显然,这一特征始终贯穿于西方文论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孟而康并非一位文学史家,因为他更重视理论分析而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罗列。因而他认为,

虽然我认为历史和理论上的严谨是必不可少的,但老实说,我却不能忽略这样的报告:以历史为基础的“比较”通常发现的是细节的相似和差异,而基于理论的“比较”则往往总是得出毫无新意的相同结论。(336)

很明显,孟而康批判地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遗产,更加重视哲学和理论而非历史事实,以便努力改变这一旧的模式。正如他所总结的,“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那些对我而言是有用的、而且在别人的比较中也行之有效的东西”(336)。从这样一种跨文化的研究中来获取例证显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人们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通过考察研究东西方的文学而得出令人信服结论。因此在他看来,“总的说来,中国倾向于道德层面,而日本则更着意于广泛的非道德说教的情感主义”(338)。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应当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无疑也正是孟而康在结束这本书时作出的总结。应该指出的是,他的上述总结依然停留在平行比较的层面,并未达到理论建构的高度。这也许正是他的理论探索的局限所在,但是这同时也是我们努力要超越他的跨文化比较诗学以便向前迈出更扎实的一步的一个新的出发点。不管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层面上超越孟而康的努力,我们都无法绕过他所作的开拓性工作,我想这就是他的工作在当下的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

在今天的全球化跨文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世界文学研究的阶段。由于孟而康的英年早逝,他未能亲眼目睹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界的这一戏剧性变化。事实上,不仅是我本人有这种理论建构的想法,就连我的一些中国同行也不无这样的建构意识,尽管其目标并不那么明显。^④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当从孟而康止步的地方出发将其未竟的事业向前推进,因为正是他率先将西方中心式的比较文学大大地拓展到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和文论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纪念孟而康并且重读他的比较诗学著作的原因所在。

注释[Notes]

④ 本文所引用的孟而康著作均出自厄尔·迈纳著《比较

诗学: 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 王宇根、宋伟杰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作者对照原文有所校改。

② 这方面的理论著述和论文可以参考下列: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③ 实际上, 上面提到的戴姆拉什的著作以及莫瑞提的论文均涉及世界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 而我本人的文章则从理论的角度对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作了阐发。

④ 这方面可参阅 Longxi Zhang, “Poetics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Yiheng Zhao, *The Problem of Time in a General Narratology*. 在中文的语境下, 乐黛云等学者也曾主编过一部《世界诗学大词典》(长春: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曹顺庆则主编了四卷本《中外文论史》(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年)。可惜由于语言的障碍, 国际学界竟全然不知。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Greenblatt, Stephen. “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 *The New Historicism*. Ed. H. Aram Veess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Liu, James.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Miller, J. Hillis. *On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 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 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

[Miner, Earl.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rans. Wang Yugen, Song Weijie, et al.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

Said, Edward. “Traveling Theor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odorov, Tzvetan. “What is Literature For?” *New Literary History* 38.1 (2007): 13-32.

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1. 1 (2010): 1-44.

Zhang, Longxi. “Poetics and World Literature.” *Neohelicon* 38.2 (2011): 319-27.

(责任编辑: 王嘉军)

